

编者按：为加强研究我国反恐战略及有关政策，本刊特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同志发表在《理论动态》（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2032 期中《关于当前新疆、西藏问题及宗教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进行转载，供有关领导和专家学习参考。

关于当前新疆、西藏问题及 宗教问题的几点思考

叶小文

关于新疆问题

新疆问题的紧迫性、战略重要性凸显,表现在:新疆“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影响已是心腹之患;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西部多有不满之声;战略掣肘会成后顾之忧。

新疆这块热土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时起时伏,从未止息。现在,西方有人企图使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祸水东移。新疆往西走就是高加索,就是中亚,这里的战略资源丰富,各种势力插手,各种矛盾交叉。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这本书里,把它称为“东方的巴尔干”。过去这是苏联的领土范围,苏联解体后,美国就趁势进入。为了争夺资源,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和遏制中国,美国企图利用俄罗斯高加索和我国新疆民族宗教问题,把原教旨主义这股祸水引向中国,引向俄罗斯。引向俄罗斯成功了,出了车臣问题。当然车臣问题最主要还是内因。所以,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对民族分裂主义必须严打,必须露头就打,绝不允许搞成气候。

“上海合作组织”将合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写入了国际公约,这是外交上运筹帷幄的成功。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其基础一度是以陆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作为欧亚大陆之间联系纽带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历史辉煌的写照。近代以来,以海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形成,我们的优势一度失去。现在我们应该创建新的政治、经济和交通纽带,努力铺设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大手笔。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发展新疆与西进中亚相辅相成、紧密联系。解决好新疆问题,不能就新疆谈新疆,必须着眼长远,统筹全局,结合着进入中亚、向西开放。中亚地处亚欧交通要冲,战略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丰富。中国积极走入中亚,与中亚五国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有助于巩固边疆的稳定、获得发展的战略资源,打通中国与欧盟的陆路交通。发展新疆,走入中亚,战略西进,关系到维护和拓展我们的战略空间。

民族隔阂后面其实是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的冲突。民族隔阂容易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极端就是民族分裂主义,经济利益、文化的冲突又强化宗教情绪,于是形成宗教派别,产生原教旨主义,而民族分裂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一结合,它就成了恐怖主义。

当前新疆处于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稳定形势严峻复杂,必须把反分裂斗争作为新疆工作的主线。但是,为什么打击加大了力度,敌人反而更猖狂?为什么境内的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禁而不止、打中有升?这其中有些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我们在搞清境外因素影响的同时,要认真分析内因。在加强严打的同时,要研究如何与民族分裂势力争夺群众、争夺人心、争夺思想阵地。不能说俄罗斯捍卫国家统一的决心不大,对其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打击的力度不够,但车臣问题搞到那个地步,值得我们深思。

宗教往往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往往使某种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助宗教张扬其个性,宗教利用民族扩大其影响。当一种宗教被某一个或某几

一个民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时,会出现特殊的两重作用:一方面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民族的神圣的旗帜;另一方面强化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它性,容易被黑暗势力所利用。当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时,就有可能产生很大的破坏力量。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越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我们越是要善于按照宗教自身的规律做好宗教工作,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我们共产党人要有这个本事。

关于稳妥推进藏传佛教宗教改革问题

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讲长期性——要害在找出规律,适应规律;讲群众性——要害在争取群众,争夺人心;讲复杂性——要害在推动社会转型,宗教改革。由于宗教渗透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中,又被民族分裂主义利用,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就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今天的治藏方略,需要更为自觉、更为主动地指导社会发展和变革(清朝没有做,1950年代是被动做)。毛泽东主持写的长篇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把当时社会变革的实质问题是说清楚了。在西藏和四省藏区,尤其在藏族干部群众中,迟早需要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在西藏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据,是始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过去是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现在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不能一方面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对严重滞后的宗教观念、体制与活动不去触动,容忍其原封不动甚至有所强化,其间形成的张力和产生的冲突,会让达赖分裂集团的插手轻而易举,从而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甚至陷入周期性的紧张和麻烦中。现在西藏与四省藏区的环境与1950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也不必一步到位,但要明确目标与方向,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自己不理直气壮,宗教人士当然更讳莫如深,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使劲。

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年,与半个多世纪前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

其是 1994 年以来中央连续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缩小了与内地发达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与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走上繁荣之路。而 1959,1989 和 2008 的三次闹事,从外因看,固然是西方加紧了支持达赖分裂集团的活动;从内因看,则因西藏实际上在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1959 是推翻农奴制建立新制度的社会革命,现在则是西藏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达赖集团千方百计利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挑起事端。无风不起浪,“风”当然源于西方支持的达赖集团。我们处理好达赖问题,关系到治藏安藏的方略。

西藏和四川、甘肃、青海藏区近年来的寺庙膨胀和宗教热,与西藏和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不断冲突的“二元结构”。现在,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在其社会的健康肌体上,却开始出现几个“恶性肿瘤”(一直闹事的大寺庙)。这类“恶性肿瘤”一旦长成,如不切除会影响整个机体的健康和大局的稳定,我们不能长期背着这个毒瘤;如切除又难免会引起阵痛,切不好还会对整个机体造成新的伤害,甚至影响大局稳定。维护西藏的稳定,要打破闹事——整顿——再闹事——再整顿的循环,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教要改革,庙要消肿,关键是“神”要定位。

关于宗教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与其它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包括无神论),与一切唯心论(包括有神论)相对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如何对待宗教,宗教又如何适应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不信神的执政党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教育好,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好?如何有效地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正确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简言之,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宗教”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的一个新课题,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关键在我们对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

(一) 要坚持政府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并进一步加强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

当前,我们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深入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应进一步具体落实,解决宗教事务条例刚性不足的问题。对宗教场所、活动、人员的管理,要有进一步可操作的细化措施。宗教都有自我扩张的行动,政府不能放弃管理,但又要发挥宗教团体管理内部事务的积极性。如何促进宗教团体、宗教人士、信教群众自觉尊法守法(“只听神的不听人的”、“神大还是法大”,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不必发起讨论,但需要解决)。自觉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宗教界要站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前列)。还要善于将政策实施与依法管理并行并重、相辅相成。宗教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是重要的统战工作,是争夺人心的工作,需要刚柔相济,很难一管就听,“一法了之”。

对宗教方面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和新出现但急需解决的热点问题,如天主教地下势力转化问题,网络传教问题,城镇化加快流动后的“藏密东渐”、“阿訇南下”、“基督西进”问题等等,要把握宗教自身规律,分类指导,对重点问题既要综合施策,又要术有专攻。破解重点、难点要因势利导,分别形成一套可行的具体解决办法,去逐渐、逐一解决。例如,当年挫败梵蒂冈在上海佘山设立“中华圣母朝圣地”的图谋,俞正声同志就提出“硬任务,强准备,软处理”的工作方针,上海为主,各方联动,结果让它既搞不起来,也闹不起来。宗教其实是“攻心之术”,我们不能“攻心乏术”。宗教工作是争夺群众的特殊的群众工作。路子、方法明确了,则需抓好落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二) 关于抵御境外基督教渗透、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基督教在局部地区

非正常发展问题

当前基督教在部分地区较快发展,既是世界性宗教跨国传播伴随着全球化而必然加剧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与西方国家对我渗透相联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打开视野。我们当然不能简单附和所谓“教态平衡”的观点,试图用行政力量去扶持或抑制某种宗教,搞什么

“以教治教”。但有学者提出“多元通和”的看法,值得研究。台湾儒、佛、道传统信仰地盘很大,民间信仰发育旺盛,“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生态根基和土壤深厚,客观上成为制约外来宗教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基督教虽传入很早,且官方受美国指使积极支持,但始终没有大的发展。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既有根基深厚的民族性宗教神道教,又有拥有大量信徒的佛教、民间信仰等,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也有限。而韩国基督教的发展则是一个反证。基督教之所以能在韩国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韩国缺乏自己本民族的信仰。在这种大背景下,基督教在20世纪初朝鲜半岛反对日本占领的民族独立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韩国民主运动中,一方面以基督教来反抗有着神道教传统的日本,另一方面也防范保持强大儒家文化氛围的中国,从而突出其民族独立、自立意识。正是因为基督教与朝鲜半岛的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将爱国融入其信仰当中,成为其“民族化”的宗教,而不是“洋教”,这样基督教才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受到人民的支持,从而得到较快发展。而其深入家庭,更形成了独有的东方特色和旺盛活力。在我国,近年来基督教“家庭教会”在北方农村就比南方农村发展更快,南方农村尚存更多的宗祠、社庙、民间信仰也是事实。这些现象,值得比较和研究。

(三) 宗教工作要服务“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又要靠“四个全面”的推进来助力,来提升和落实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思

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不少人出现困惑、迷茫和混乱,难免到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面对历史的深层积淀和现实的尖锐矛盾,我们如果只是满足于理想的目标,只能进行空洞的说教,贴不进、够不着、跟不上,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争夺群众、争夺人心,就会不但不能把普通大众提高到先进性层次上来,反倒给那些接近他们思想的宗教势力,甚至像法轮功那样的歪理邪说留下发挥影响的空当,为迷信意识的死灰复燃提供空间,以至于法轮功邪教冒出来后,迫使我们不得不设立专门机构,摆出大阵容,与之长期较量。其中教训,应该思量。

(本文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殷真